

内部 / 外部，意识形态和文化¹

杰夫 伯纳德著
赵禹平译

本文主要讨论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符号学，特别是其社会符号学理论。他的理论研究采用符号学分析方法，着重强调“身体和对象的强大物质性”(Bernard, 1983, p. 176)。罗西-兰迪的分析主要依据符号学理论，这是由于他的理论建立在一个拗口的人类学原理基础上：自然在整体上向文化的转换，亦即指向社会性的自我进化。这种转换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并且必须具备资料、设备、劳动者、操作、劳动目的和产品等生产要素。材料经过无限循环劳动，转换成产品，尽管所有材料都相互依赖，但马克思 / 恩格斯主义者依然在其中发现了“自由王国”(Woolfson, 1982, p. 5,9; Rossi-Landi, 1995, p. 147)。符号可以被描述成材料（能指和所指），并通过符号操作（sign-work），共同构成产品（signum）。符号操作引起了社会存在物（所指）的转换，所指通过与之相对立的物质（能指），转换成一个社会产物，即符号本身。毫无疑问，这就是符号自身生成和符号再生产（符号使用）以不同方式运行的整体规律。部分符号（再）生产发生在个体内部，另一部分则在外部。思维（意识形态）和交流是（符号操作）这面金牌的正反面。而社会正是建立在大量人工制品、普通材料、符号、语言和非语言之上的。

罗西-兰迪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所谓的同型模式（homology model）：一个包括材料、语言生产，从结果上看是普遍的符号生产的10步辩证性跨越的11阶段模型。符号——符号系统和生产过程，还有最后的“公共符号过程”(Biancofiore/ Poncio, 1987: 29; Poncio, 1990)——在社会再生产中，扮演着一个绝对核心的角色，它构成了生产、交换、消费三元生产运动；或更应该说，它是由三元生产运动构成的。其中，交换既表现为普通的材料交换，也表现为符号交换，即交流。一切相关活动，包括“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都促使社会发展自身：在借助工具的情况下，社会实践创造历史。以此为背景，本文试图借助符号过程、或曰符号学思想及分析，论证材料性、交流性和意识形态性人工制品（或据作者所言，是狭义上的人工制品、符号物质和精神产品）三者间拗口的相互作用及多样联系，特别注重探讨内部、外部符号的复杂联系，也就是说，内、外符号（符号操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与社会实践必须参与其中的人造环境之间的联系。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依赖社会符号学最重要的学者——罗西-兰迪的著作，在其著作中，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如此，此类社会符号学研究，最早要追溯到巴赫金的名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Volosinov, 1929; Poncio, 1986, 1988; Bianci, 1995; Bernard, 1994; Bernard and Wiltham 1987; Bernard, 1992; Rossi-Landi, 1961, 1968, 1974, 1975, 1978, 1980, 1985, 1995)。虽然罗西-兰迪在许多场合谈论过文化、及自然向文化的转型问题，但他并没有明确设想洛特曼和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所极力推广的“文化符号学”(Bernard, 1993)，也未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文化理论，而文化理论如今在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意义上已广泛地为人所知。因此，以一个全方位的视角考察意识形态和文化，也需要吸收其他资源。

但是，研究这些领域，还需要了解其他理论发现。谈到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我们需要理解他们提出的“符号-文本-文化”层次结构，（实际上，并非偶然，这本书的标题是由艾默马赫（Eimernacher）和格日贝克（Grzybek）两位杰出专家提出的；Scheffczyk, 1986, pp. 166-168, St ädtke, 1981），也包括对其概念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缺失的批评（Rosner, 1984; Bernard, 1985, pp. 162- 163）。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应当回溯英国文化研究的根源。一方面，

应当回到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范式（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及所设立的遗产；Bennett, 1996, Turner, 1996, Hepp, 1999）。另一个，是对同时期在德国，由罗尔夫·施温特（Rolf Schwendter）一手建立的类似的研究方法，即亚文化理论（Schwendter, 1971），亚文化理论提供一个涉及文化经验差异性和内部矛盾性的背景——使文化不仅是一种“语言”；更多时候是一个承载“符号战”的领域。也就是说，必须将莫斯科—塔尔图的层次结构扩展为“符号—文本—文化—总体文化”这样一种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总体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其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且各具潜力的领域，而不是超语言或超符号系统，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它是一个语境，一个大型文本（megatext⁺）（+和—说明它的开放性程度）或者互文文本。

但是，下述模型能够被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它的两点特征。首先，运用符号学方法，至少能解决其他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而采用其他方法，并不能充分解决内部 / 外部问题（更不用说意识形态 / 文化问题），如认知科学（在“心理再现”中可用，但貌似并不涉及符号概念；Atmanspacher, Dalenoort, 1994）——而符号学（任一类别）则被定义为介导性理论，它的介入有助于二元问题的解决。其次，可上升至托马斯·A·西比奥克（2001年）主张发展的“全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它反映了自符号学创建以来的整个符号学观念。这一主张，在即将出版的苏珊·佩特里利和奥古斯托·庞奇奥《符号学无疆界》特定版本中，才被介绍。其中，罗西-兰迪被认为是**智人**这个物种中与“**公共符号过程**”最紧密相关的人物。

一、普通同型模型

社会，就其操作—工具性方面而言，依赖于一个人工物质世界：一般意义下的人工物质，包括语言、及意义-交流领域的人工物质。罗西-兰迪（1974, pp. 200-204; 1975, pp. 70-120, 107; 1985, p. 47-98, 84）着重发展了他的同型模式的后10个阶段——从未接触的大自然的0阶段开始，再通过循环劳动——基于呈现了分节和人工制品的四个层次的四个辩证性跨越，最终形成社会再生产设备的：1）前表意因素（pre-significant elements），2）不可化约的表意因素（irreducibly significant elements），3）“整体”（‘whole pieces’），4）工具和句子（tools and sentences），5）工具聚合（aggregates of tools），6）机制（mechanisms），7）合成和自为（complex and self-subband），8）整体机制或自动机（overall mechanisms or automata），9）不可复制（单一）生产（un-repeatable (singular) production），10）全球生产（global production）。在“材料和语言生产之间的同型”的规范下，不同生产领域具有内在生成结构的一致性，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恰展示了这种一致性。依靠这种同型模式，我们进一步起草了一个“一般性同型模式”，其中，对罗西-兰迪同型模式中的某些项稍作调整，分别系统性地阐述了外部符号操作和内部符号操作这两个项。因而，第一步，是在意释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的基础上扩大其包含范围，包括三个10阶段层次（缩写：c/a=合成和聚合；OPU=一个生产单位）：A）人工制品（更进一步讲）：1）物质，物体，合成物体，设备，合成设备，机器，合成机器，自动机，原型 M，一个生产单位的所有物体系统；2）符号物质：能指，符号，合成符号，超符号，合成超符号，文本，合成文本机制，亚编码 / 符号目录，原型 S，一个生产单位的所有符号系统；3）精神产品：能指，观念，合成观念，意识，合成意识，意识形态，合成意识形态范式机制，意识形态 P，意识形态 N，一个生产单位的所有意识形态（在此：符号 e=外部符号，符号 i=内部符号，原型 M=材料原型，原型 S=外部符号原型，意识形态 P=消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 N=中立意识形态）。然而，第二步，则需在莫斯科—塔图学派关于符号、文本、文化研究基础之上（见引言）来补充、扩展模型（以某种方式，也是从自然转换成文化开始，进入到更多复杂形式中）。

通过“人类学”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理论性研究和同型模式之间的关系。其中，研究方法包括各种各样人类学专用方法，甚至“人类学法”，但是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最系

统的方法，是罗兰·波斯纳（1988年）综合了符号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他发现，各种各样的人类学方法可以简化为三种方法：“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制度相关），“物质人类学”（与日常用语意义下的人工制品有关），“文化人类学”（与精神产品相关），同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社会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符号的使用者，文明是（一套）文本，文化便在狭义上是（一组）符码，那么这三个领域就是系统地联结在一起的，不能做单一考察。因此，符号学方法给人类学学科研究提供基本论证条件。此研究方法依赖一个假设：文化活动是基于约定性的符号过程，是表意中包括了符码、文本和符号使用者的符号活动。（Posner, 1988, p. 173）

这段引文总结了符号学如何对现有的“人类学”进行基础性补充。至于“精神产品”概念，已经被内部符号所普遍借用，是普通同型模式的人工制品三个主要类别之一。如果“精神产品”是内部符号，或“思维符号”，那么显而易见，“符号物质”就是外部符号，即（首先是）交流性符号。

普通同型模式将罗兰·波斯纳对人工制品生产的结构—生成性层次的封闭性分析（或他所谓的“隐形结构”），发展为关于所有人工制品的“系统和进程”分析，于我们而言，首先要明确该系统包括所有符号的“系统和进程”，其次，这些符号“系统和进程”是由内部符号操作来呈现。总之，普通同型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它在 A_{sp} , S_e （交流沟通中的外部符号），和 S_i （内部符号，即更广义上的“意识”，作为一般性人工制品的子类起作用，但是也作为一般性生产层次的结果而成立——用联系的观点来讲：交流中的外部符号作为普通材料的一个分支，内部符号作为交流中外部分支的分支，因此，普通材料除去一般性人工物质的子成分后，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 $d\Sigma(A_{sp}(S_e(S_i)))$ 中，分辨出一般性人工制品（ A_{gen} ）和更小观念（普通材料）人工制品（ A_{sp} ，即日常人工制品；因此，在图1中简单地称为“人工制品”）；或者，如果用人工制品、符号物质（S）、精神产品（M）三个术语来讲，关系应当是： $A_{gen} = d\Sigma(A_{sp}(S(M)))$ 。正因为这三类人工制品总是联合出现，因而一般性同型模式同时也是阐明“人工制品共存”的模型。因此，“共存的相关性层次”（0, 1, 2）已在图1中表示出来。当代多数符号学家都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符号学核心任务，那就是对这里提出的“人工制品共存”进行深入研究，“人工制品共存”当然也包括在各层次之间进行的符码转换问题。重视“人工制品共存”研究，对符号的内化 / 外化而言（符号物质变成精神产品，反之亦然）尤其重要。

物质，符号和精神生产的同源性

人工制品	符号物质	精神产品	
Material substance 材料物质	Material substance 材料物质	Bio-energetic substance 生物能量物质	0
Matteremes 物质	Signemes _e 外部符素	signemes _i 内部符素	1
Objectemes 对象	signs(1st order)符号 (一阶)	Ideemes 思想素	2
complex + aggregated Objectemes 合成+聚合对象	complex + aggregated signs 合成+聚合符号	complex + aggregated Ideemes 合成+聚合主意	3
Tools 工具	supersigns (1st order)	Ideas 意识	

	(= signs 2nd order)超 阶段符号(一阶)(=二阶符号)		4
complex + aggregated Tools 复杂+聚合工具	complex + aggregatedSupersigns 合成、聚集超符号	complex + aggregated Ideas 合成+聚合意识	5
Machines 机器设备	texts(= 2nd order super signs= 3rd order signs)文本 (=二阶超阶段符号 = 三阶 符号)	Ideologemes 意识素	6
Complex machines 合成机器	Complex text mechanisms 合成文本机制	Complex ideologematic mechanisms 合成意识形态 生产机制	7
Automata 自动机	subcodes and sign inventories 子代码和符号存 储	Ideologies 意识形态	8
Complex automata 合成自动机	codes, programs +代码 程序 entire sign elementics 整 体符号元素	Complex Ideologies 合成意识形态	9
Material cultures 材 料文化	Expressive Cultures 表征 性文化	Mental cultures 精神 文化	10
	“culture”总体文化		11

图一：普通同型模式

目前论证的主要任务是（有关符号，特别是“文本”阐明外部和内部符号操作的关系，即（最终在交流当中）思维（*thought*）和思维表述（*utterance of thought*）之间的关系。以其著作的独到观点而著名的马克思提出：思维以语言为外衣。这个有深刻见解的比喻暗示：在某个外在向度上，外衣与身体等同，但绝非完全一致。这个比喻说明此处提出的模型与其他模型的不同之处；在模型中，语言自主性（符号系统）或观念的实质性、普遍性预设，都通过语言来推测（首先通过符号系统中最具特征的“自然”语言，但实际上也需要通过其他符号系统）。但是，这个模式不仅和在灵长类动物思维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哲学的古典传统相悖，且与“认知科学”的某些方法也相悖；这两者认为，思维是一种自治活动，而语言或符号系统则仅仅作为思维的车轮，起着支撑作用而已，因此是可以被忽视的。

现在来简要讨论一下第一组观点，它声称语言同源性或语言相对论，并指出单一个体往往不会发现他/她“仅仅”所处的“话语十字路口”且受控于“结构”但是，这些个体可以反作用于话语和结构，从而使个体和集体相互影响。毋庸置疑，在语言（和一般性符号系统）中，存在着一种整合世界的知识，并且此类“储存”“凝结”世界的知识，总是具有决定性作用。呈

现存在于世界上的全新事物是可能的，通过某种创新联合方式呈现关于世界的全新事物更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持续发生在个体层次，首先是在思维内部、或者通过思维，进而被外化、被传达。正如罗西-兰迪在材料和语言生产的同源性模型所示，人们有能力在外部符号域中发展“原型”；不仅如此，在内部符号（即思维）领域也可以发展“原型”；或者从意识形态层次来讲，人具有“自我生成”能力，能够生成新观念并最终形成意识形态。这类原型，和人工制品、符号物质相联系或同型，下文将详细论述。

我们需要格外关注内部和外部符号生产的相对自主性（和相互依存性），相互独立性意味着可以完全不需要、或不需要许多句子（冗余的或主要用于交际的句子）。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单词被说出后，创建了一个冗长的“文本”，然而它表达和传达的也许只是一个“意识”，甚至什么也没有。另一方面，与其他位置相比（思维的自主性），我们也许从根本上认为，设备、技术和技术系统，无疑对我们这些生产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决定了我们个体以及集体性的行为，也决定了我们的符号性的、理智性的行为，这些都显而易见。同样需要明确的是，如果符号学领域以及认识论领域（或由认识论所定义的符号学）运用的生产理论方法被采纳，那么，外部符号所用“技术”被应用到内部符号产生时会产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才是关键所在，反之亦然。内部符号生产和外部符号生产相互依存，这可以通过对大量经验性实例的考察而总结出来。此外，这个相互依存也证明了内部和外部符号对物质系统的反作用（反之亦然）。所有这些“系统—加工”操作在功能上紧密相连。换言之，我们作为人类个体，在工作中，会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具体情况，将多种方法共同加以使用。再次强调此观点：相互依存现象，是视不同情况而定。

在讨论“意识形态”以前，先对普通同型模式作简要介绍。更确切地说，是对图 1 的构造作一个简要评述。首先，图表考虑到罗西-兰迪关于同型性和社会一般性再生产三元结构的研究，因此不需要再重复这个模型的基本原则。辩证性跨越(参看图 1 的左边弧)需要保持处于运动状态，但“分节”，人工制品的“停车场”等，就不需要再显示出来了。图表足以说明，从普通材料对象和对象系统的层次结构，到（外部）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层次结构，包括各种复杂文本（超符号）、直到“一个生产单元的所有符号系统”，都基于结构性生成因素，能够有效地作用于内部符号生产。

除此之外，应当注意“一个生产单元的所有符号系统”（罗西-兰迪所用术语）和被视为超文本的“文化”（超文本的极端现象）之间存在的巧合现象。实际上，重点不止在此类文化，还包括文化（cultures）：文化 1，文化 2，文化 3……文化 n，然而“此类文化”依然需要被呈现出来；尽管只在最高一层得到展示，但比起将此层次隐性表达的罗西-兰迪，这已是一种超越。图 1 所示的是两个概念的总括：生产的同型和社会符号学角度下“模型系统”层次结构的精致版本，这个精致版本最初是由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提出。第一个概念显然是后者的基础，但没有结合其他任何思想；而后者在得到一定程度修改之后，形成了新概念。

另外，罗西-兰迪的术语“重组”（reognazation），也尤其需要考虑符号物质的层次结构（也在普通物质范围内）。罗西-兰迪一生都致力于语言生产问题，“重组”正是在共同符号过程（common semiosis）基础上生成的符号过程模型。这种半新的术语既适用于符号理论（sign-theoretic），又应用于文本理论（text-theoretic）。然而，它与我们所采用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用归纳方式描述层次的术语并不相容。符号理论或文本理论是否成立，取决于科研任务和环境。然而，至关重要是：图表所示的最高层次上，“总体文化”和“文化”引入后，形成了一个显性的文化理论（culture-theoretic）模型。运用符号学解析旨在突出文化固有的分节，可以理解成是对亚文化（subcultures[s]）理论所建立的经验性分节模型的补充（详见 Schwendter, 1971），呈现出文化研究更丰富的方法途径。

要结合同型模式与亚文化理论（而且是受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启发），有必要重新考虑罗西-兰迪的第 9 阶段和第 10 阶段。虽然“重构”在图表中已得到清晰显示，但在这里仍然

要做一个说明。特别是在第9阶段上，有一个新类别——合成自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材料技术的发展，作用日益凸显，主导地位也在与日上升。通过这一观察，可以断定的是，这一类别是罗西-兰迪所处时代无法正确观察到的。认识合成自动机这一层次，对认识符号物质和精神产品同样有用，下一步就是要严肃地认识（或重新认识）“第二个模型系统”（因为从第一步辩证性跨越到第二步的模型系统是本质性的），但不需要考虑罗西-兰迪关于材料和语言生产的同型性模型。普通同型模式承认，从第8阶段开始，通过第9阶段时候，存在一个积累的过程，经过六个跨越过程中的最后一个辩证性的跨越，最终到达第10阶段，在低层次上已经充分发展了（同时被扬弃了）的材料文化便显现了。此类情况，在符号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同源等级也同样存在。事实是，在第9阶段上，符号物质等级中，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出现（符码、程序和整体元素），并揭露古典语言相对主义的缺点。如果语言仅仅被作为“**系统**”（或“**结构**”）亦即“语言”（langue），那么语言（langage）就不需要被研究观察。因为语言（langage）更适合被视为罗西-兰迪所称的“公共话语”（common speech），它将公共语言（language）和个人话语（speech）辩证性地视为一体，并被界定为**文化现象**。它是表现性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语言（languages）是表现性文化（cultures）的组成部分。

接下来要阐述的是普通同型模式，着重阐述精神产品等级。在具体阐释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即内部符号或观念物质的概念。这个模型表达的一系列概念：思想素（ideemes）、意识（ideas）、意识素（ideologemes）、意识形态，和人工制品、符号物质等级中对应的概念相似。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思想素”不完全等同于符号物质等级中的外部符号，“意识素”不完全等同于外部超符号，意识形态同样不完全等于文本等等。反之亦然。这种相互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复杂问题。但原则上，我们可以用社会符号学的创始人观点声称：

所有符号都是意识形态。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符号特征……符号特征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意识本身可以通过符号的物质实体化得以表现出来，并成为真正的事实。
(Bakhtin i.e. Voloshinov 1929 after Voloshinov 1975: 56-57)

但同样真实的是，符号不能被简化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不能被简化成符号，这是因为：

意识形态是一个合成产物，这个产物包括日常语境里通过语言[和更广泛的获取方式：符号系统;作者注]获得的全部资源。正是通过在话语（discourse）和反思层次上运用语词符号（verbal signs），意识形态才得以产生……我们能够通过语言发现意识形态，是因为这两个实体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彼此等同……一方面，有人坚持认为，“语言‘是’意识形态“，同时“意识形态也‘是’语言“，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符号生产和意识形态体系被分节后，进入它们自己内部层次的不同层面。这两种观点是不矛盾的。（Rossi-Landi, 1990, pp. 243-246）

罗西-兰迪广泛地描述了意识形态体系的层次结构（1978/1980/1990），但主要是根据不同“重力”下意识形态体系经验性存在的“类型”而描述的。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非情感性）态度，行为模式，直观的世界观；世界观经过系统化，直达哲学理念高度的世界观。同时还要考虑不同类型的“虚假思维”，例如：幻觉/自我欺骗，谎言/弄虚作假，欺骗/欺诈，最多的是（系统性的）错误思维。但是，我们的陈述目的，是根据结构—生成方式，以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为出发点，通过展示各类意识形态的构造原则，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因而，必须要采用已引证的经验类型学，并且发挥其基础性、辅助性作用。例如，在识

别和分析“真、假思维”、“真、假”意识的混合形式时候，我们实际上明确区分的是“贬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_P）和“中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_N）。

很明显，“思维大厦”（或“意识”）可以通过“友好使用”的方式，或介于友好与不友好之间的方式得以解释。他们可以由现实—充足性合成物构成，但也可能被错误地构造，例如走廊和通道不畅，或者原地转圈，更甚则进入到迷宫之中。而虚拟的“思维大厦”实际更为复杂，例如小说或其他艺术品。至于意识形态 P 与意识形态 N，似乎也同样明显：不同的世界观，可以从真实系统的一部分，也可以同时从分散、困惑甚至是模糊的那部分形成。客观化的段落可以在受到削弱的偏见性段落下立足。直接或理性的证据，可以夹带俗套的、话语套路的伪论证等等。由于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识别和澄清混合物中的异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完成这项任务必然需要一系列合适的途径。普通同型模式，清晰地展示了意识形态内部结构这一横截面，明确了精神物质层次上的内部符号生产等级。

二、精神产品各阶段分析

0 阶段：在开始的时候，或者在与未来各级相连的开端，只存在“原材料”。重点是“材料物质”，促使智人基于极为漫长的进化发展后，启动思维加工或进行“脑力劳动”。这种能力取决于“生物能量物质”，它这里被理解为促成物质生产和外部符号的生产“材料物质”。在内部符号生产中，这一经过一定程度的积累和提炼的大脑物质，是整个大脑 / 心灵（mind）的心理——身体的物理——生物—侧物质，或承载“人类个体”的心理——身体运作的那部分材料。即使在最复杂的精神生产中，该材料仍然作为生物—能源物质必备要素。“心灵”永远不可能从“大脑”中剥离出来，因为心灵是大脑的产物。从进化意义上讲，大脑也是心灵的产物。在生物能量物质这一层次上，人们设法走出了第一步，而这第一步的质变则涉及到向建立一种内部符素（signemes）的量变。

阶段 1：这是“前意指项”阶段（已存在而不携带意义；德国术语以及以下要点、观点、形式规范，参见罗西-兰迪，1974，p. 200-204；英语形式，参见 1975，pp. 80-108），在这一阶段，符素_i，即内部符素出现了。我们已经有意地将符素_i和符素_e——即外部符素加以类比（在“自然”语言、音素或独立单位中）。因此，符素_i只是前意指项，它不携带意义，在术语规范上接近符素_e的形式，尽管前者不仅仅是后者的“反映”。符素_i，是内部感知、内部加工的结果，加工过程包括聚焦、“理解”、特点比较、异同鉴别，该结果是对想象的基本内容进行辨析的结果。然后，完成从 1 阶段到 2 阶段的过渡，这是第二次质的飞跃和转换。

阶段 2：这是“半加工输出单位”（半制备初始单位）阶段，大脑工作中把这一单位叫做“思想素”（ideemes）。某些已经是“不可化约的意指项”了，如语言生产领域中或普通材料生产领域中，存在的语素或其他单词水平以下的材料。普通材料生产以对物理材料做出长期补充性修改为特征，这一修改内容将作为下一阶段“整体”的组成部分再现。在意识形态的生产领域，思想素作为补充性修改内容，对想象力的基本内容做出补充修改，将意义分配到这些内容上。因此，思想素肯定了意义运输单位的作用，尽管这个意义仍然是不完整的。思想素承担（或简单地说：是）意识的一部分意义。

阶段 3：这是“完全和可分离部分”阶段。根据罗西-兰迪已经提及的“重组”这一术语，即“复合和合成思想素”（目前只低于 2 阶段），这一层级是所谓的“完全和可分离部分”。这些“合成思想素”，正如在所有更高级别的条目一样，携带意义。在普通材料生产领域，罗西-兰迪称这些实体为“片段性整体”，并特别强调“片段”（组成部分）的作用，例如锤子往往被关注的是其头部或其重量，并不是锤子本身。在语言生产领域，这些“整体”是由词和句子以下的语言单位（句法，词组，成语）构成。用一个类似的方法，可以将意识生产领域中“合成思想素”，理解为最简单的“观念习惯”、或德国所指的“思维图”（Denkfiguren），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思维图”的组成部分。从 3 阶段到 4 阶段的转换，完成了第三个质的飞跃，或

第三个转换程序，这个转换在经过 2 阶段和 3 阶段的量化积累后，终于要实现了。

阶段 4：这是“工作适用装置/方法”阶段，“适用的工作设备”可以是精神物质等级所谓的“意识”——“思维图”的等价物。在普通材料生产领域中，在第 4 阶段上发现了一些简单的工具，从完全有效的角度而言，这类工具因其固有形式，被应用于简单的工作程序中。在语言生产领域，这些工具是简单而完整的句子——传送简单信息的“自治”句。另一方面，“意识”是意识形态生产领域一个简单却还没有自我完成的“思维图”或简单信息的模型化。因此，他们不是维特根斯坦认为的语言“工具”，而是句子本身。更为明显的是，当考虑到意识形态等价物时，不是“合成思想素”使我们真正意义地进行思考，而是“意识”本身的发展，尽管它依赖于前一个和初级阶段。

阶段 5：这是“合成工具”阶段，或曰工具的合成化。在意识形态生产领域，“合成工具”被称为“合成意识”，因为“合成意识”和“合成工具”可以在同一个层次上出现。在普通材料生产领域中，合成工具适用于多个使用场合，同时，多个工具适用于同一个使用场合，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的。同时，在语言生产领域，合成句子同样存在。“合成意识”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复杂程度的累积、结合的意识（或“思维图”），它将会因为缺乏一定的内在规律性而改变此刻的境况，进行第四步跨越。只有第四步辩证跨越能够颠倒 4 阶段和 5 阶段的人工制品，在量化积累后实现转换，达到“机械”化水平。

阶段 6：这是“机制”阶段。在意识形态生产中，此阶段上的“意识素”（ideologemes）这个术语，早已经作为科学术语被广泛使用，有时甚至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机制是材料意义上的“机器”。机械就是系统地组合而成的工具，它们根据具体任务和工作能力，系统地组合而成，形成良好的组织。这个工作过程，是在结构内部预先形成的。类似——或者更确切地说，同型——特殊类型的机器在语言生产领域中依然存在：有组织的，有明确导向的、完整的句子，如三段论、论证、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正式关系，它们可以以发出者/接收者 - /抽离具体语境的方式去交流颇为确定的东西。因此，信息存在于结构内部。它们必须结合/组织/定位任务的知识工具或“大脑工作机制”（即更复杂的可以被均匀地或在正式场合中使用的“思维图”），才能被应用到“意识素”。因此，这个系统的“思维串联”也存在于结构内部。它在演绎、归纳、推理溯因、辩证结论、图示成分过程、以及规则导向“思维习惯”、模型、模式、以及定型和相关构造中，已经预先形成了。

阶段 7：这是“合成自我补给机制”阶段。在意识形态生产领域，被称为“合成意识形态机制”。另外，累加原理也描述了这一阶段，层次越高，原理之间的密切度就越高。至于在材料生产中，这一阶段是被合成机制所占有，完成一些工作流程后，随即结束组合。在语言生产领域，“合成文本机制”如专著、论文、演讲和书籍，都涉及多方面的、复杂的任务和联系。思想的合成意识素机制同时出现在意识形态生产的同一层次，因为思想或多或少地包含意识素，并相互关联，这也被称作“意识素性”（ideologematic）。他们建立有组织的实体，但仍要求输入和“调整”，因此没有达到第 8 阶段。这个有组织的实体，需要第五个质的跨跃和转型过程，才能够产生“自动机”（这是第 6 阶段加第 7 阶段的关键，经过量化积累以及增大纠缠密度后，也必定实现质变和转型）。

阶段 8：这是“总机制”（Gesamtmechanismen）阶段（或曰“自动”、“总机制或自动化”）。“总机制”包括意识形态生产领域中的特殊自动机——“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意义变异通过一定的政治、历史发展，如今占据了主导地位。即贬义意义（意识形态_p）作为意识形态不断批判的结果（而中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_N”指的是产生于启蒙时代的这一概念高尚的哲学根源，当阶段 10 开始得到讨论时，它将清晰地阐明“意识形态_N”是否仍会出现在模型中）。在普通材料生产领域，“总机制”是自我调节的自动机器，正如计算机和机器人是完全有能力取代人工作一样。大致而言，从语言和外部符号体系的角度讲，这一层面包含了自足的亚符码和相应资源，在各种仪式和典礼上同样如此，在各种实践中，它们具有强大的制约和吸收能力。

这样，在这一层面上，当思维的“自我调节的自动机器”或曰综合性“思维仪式”“自动化”不再尝试激发思维的自我生成能力以发展意识形态 N（换言之，将个体发展为“成熟文化”时，便具有了将个体强行凝聚为“结构”的一般趋势。也就是说，意识形态 N 能够出现于第 8 层，但不一定出现。

阶段 9：在描述“合成意识形态”这个层面上，将列举的是不同的“原型”(prototypes)（或“不可重复生产”），看起来罗西-兰迪的图式似乎应当被遗弃。然而，他的模型毕竟已经适应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考虑到一个事实，经过世纪之交，机械领域的物质进步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罗西-兰迪提出同型模式那个时代了。如今的自动机已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如计算机和信息通信联合形成了信息网络，亦即信息技术，在信息社会中，不仅仅是机器人可以在工厂工作，连植物本身也已经成为巨型机器人。此外，材料运输系统也近乎为自动化监管系统，“仿生学”和它的自动化特征，在机械领域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有了这个有力的证据之后，我们必须承认，从阶段 8 开始，内部符号经过不断量化积累之后通过阶段 9，再由于一些结构性生成原因，经过最后一个辩证性跨越至阶段 10。在符号物质生产层次的阶段 9 上，语言的“结构”可以被描述为“合成自动机”，包括符码、程序和整个系统，通过使用来“说话”，反之则不成立。同样，符号系统的“结构”一般也可以在抽象的、“自动”阶段被加以描述，尽管系统各不相同。但是，如果不“洞悉他们的计划”所有的符号系统就会像一个半自主或称霸的一般“符号性资本”运行（联系关于“媒介的力量”的讨论）。最后，对于在精神产品层次的合成自动机而言，思维的“自我调节，自动机器”或“思维仪式”一定要被掌握，它们甚至是更为复杂的、包括如集权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_p）。因为实际上，它们吸收人类生活同源性的方方面面，是对启蒙世界观的真正嘲弄。同时，另一方面，后者（意识形态_N）可以而且必须得到发展，因为它是人的意志和目标的模型世界。

阶段 10：“（精神）文化”——这是从阶段 8 开始、尤其是阶段 9 以后，通过完成第六个辩证性跨越之后所达到的阶段，其中包括在低阶段上通过积累、相连、最终转型后取得的所有成就。在这个自然和文化辩证统一、曾存在众多完美自动机的图式中，重新思考人类个体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趣的。但是，重点在于必须保持人类最复杂的“作品”，那就是文化——一个同时包含个体和集体努力的产物。根据文化不可否认的矛盾性的存在，人类首先创造的是总体文化，而不是某类文化。因此，在普通同型模式，第六步和最后一步跨跃的结果是总体文化的呈现。出于系统、经验的原因，必须指出的是，“材料文化”是人工物品等级上，大量工作投入而产生的结果，“表现性文化”等同于符号物质，“精神文化”又和精神物质一致。然而，需要牢记的是“共存人工制品”，尤其是在阶段 10 当中的“共存人工制品”，它意味着三类文化的互相交融、共同发展（参见 Posner 在 1988 关于“三种人类学”的结论）。否则，一个有关精神文化的不为人接受的矛盾观点就会产生：他们会如何超越个体？他们可以通过交流实现超越，但这也意味着会立即发展为表现性文化，并被任意符号物质所传达。这样，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_N”的要点，作为个体的“精神文化”，再次浮现出来。因此，罗西-兰迪的“不可重复生产”或“原型”（他的阶段 9），并不会被遗弃，而是在“文化”范畴和相关的个体（或小型群体）“文化”一极中遭到扬弃，当然，这一概念同时也涵盖集体一极。概括地说，“材料文化”包括规模一端的物质原型以及另一端的材料生产，材料生产在一个生产单元中进行。此外，“表现性文化”包括表现性原型以及一个生产单位的全部符号物质。最后，“精神文化”是基于对能够被“集体化”的“意识形态_N”原型可转让特征而存在的。

阶段 11：“文化”阶段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第一，它形成一个**语境**，这个语境经过物质、表现性和精神文化的相互关联而得以形成；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是由对话，特别是冲突性对话所构造的大文本互文文本（文章开头已做解释）。通过借鉴普通同型模式的文化理论（culture-theoretic）知识，将由莫斯科-塔图学派提出、经由伯明翰学派的社会符号学或施温特的亚文化符号学所延伸的“符号-文本-文化”层次模型，发展为“符号-文本-文化-总体文化”模

式。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模式，特别是关乎“较高的辩证性阶段”的模式（Threadgold, 1987），并不与罗西-兰迪模型相矛盾，但某些特定的或扩展的要点并不在他几十年前的研究视野内。这一模式引用罗西-兰迪模型的阶段 10，将其分为 10、11 两个阶段（新的阶段 10 也包括罗西-兰迪的阶段 9 中关于“原型”提出的宝贵见解）：关于“全球生产”；罗西-兰迪发展了一个真正全面的观点：

“全球生产”的累积生产，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文化，一种极端的情况，即理论上的集体……人类的生产，（Rossi-Landi, 1974, p. 204）

这使新的模式初具雏形。

三、结语

我们应当继续说明内部、外部符号操作的内部结构，即**符号操作者**和**意识形态操作者**如何工作问题（大多数场合中称“脑力工作者”）。由于在生活世界——即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一些严重后果，人们当然应该更深入地区分意识形态_N和意识形态_P。应该重新设定模型，作为社会再生产三环节（物品、符号、意识形态的生产、分配、消费）的补充，去阐明商品、符号、意识等的关系问题。目前，许多问题必须保持开放性（见 Bernard 的著作，即将出版）。由于某些实际原因，我们并不建议用一个框架，即“叠加模型”，对文化（Culture[s]）进行具体的符号学研究，这里简要地重新介绍相互关联的四部分（伯纳德，1992, pp. 1645 -1647）：

A.符号输入 1：生活中的符号实践，通过各种符号学采用的方法而被检验。但是，这些方法一定要和社会符号学兼容，才能居于 C 中的叠加模式里的核心地位。

B.（亚）文化符号学理论（此处指由 CCCS 和施温特类型意义上的）作为或者基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学，是出于为 A 级测试结果系统性定位的原因，用澳大利亚符号学研究协会文化社会学术语来描述。（反过来，也如此为其提供社会结构主义装置）。

C.社会符号学作为一般符号学，是从社会再生产的符号中分离出来，正如罗西-兰迪和普通同型模式所言，也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为了使研究扩展为具有整体性视野，这种做法值得一试。

D.符号输入 2：作为社会经济指标，它描述了一种运作模式，并出现于在流通领域材料生产层次上的再生产统治系统中，且和社会实践、媒介、历史的三元运动息息相关。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释所有问题，而只是意在揭示其可能性和互相交互的特性。（值得推荐的是长波理论的更新版本，见 Mandel, 1972, 1983；另，参见 Petrilli 和 Ponzio 即将出版的关于“通信生产”的研究）。

本文原题为 Inside/outside, ideology, and culture, 原刊载于 Semiotica 148-1/4 (2004), 47-68



(杰夫·伯纳德)